

一个非工农兵学员的故事

荒唐的真實

域外山人

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也是一个真实的年代。
那是一个不幸的年代，也是一个幸运的年代。

——仅以此献给我的同学和同龄人

目录

引子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停止招生不上学 废除考试闹革命

察举上品无寒门 征辟下品无世族

破旧立新红领巾 造反串联红卫兵

天安门国庆游行 毛主席北京接见

南下株洲拜韶山 翻窗卧底只等闲

东进闷罐赏西湖 飞撒传单闹上海

访古都虎踞龙盘 驻炮校拜先总理

造反派变保守派 红卫兵成反革命

闹武斗头破血流 走为上老家寻根

复课革命返学校 社会逍遥在人间

文化革命庆胜利 干部学生齐下乡

淡忘之后谈遗忘 特殊之中道奇遇

入高中百废待兴 提干部咸鱼翻身

镇境山心远地偏 三游洞世外桃源

物理数学回宜昌 英文绝密去北京

遇搬迁没头苍蝇 待入学好事多磨

尾声

引子

革命，是一种对现状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通常是人类的暴力行动，是对现行体制的破坏。不管它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十月革命；不管它是中国近代史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概莫能外。

历史，不管对当事人来说，是痛苦的还是幸福，对于后人来说，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因为后人会以史为鉴，去记住劫难，去感恩生活，不再重蹈覆辙。作为经过五十年前那段特殊历史过程的我们，有责任把这段曾经的经历记录下来，让这些涓涓细流，汇入历史的洪流，不被时间无情的磨蚀而埋没，让后人得以客观地了解和评判那个时代。

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具体的个人同样如此。我和我的同辈人，曾经度过了文革那段时光。其中有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个体身上。如今，半个世纪过去，这一小批人正在老去，他们的故事正在岁月中如烟淡逝。更不要说，这些经历不仅后人不知，就是我们的前辈，甚至大多数的同龄人也未必知晓。

如果，今天你跟学生讲，上幼儿园不要考试，上小学不要考试，上中学不要考试，上大学也不要考试，不用猜，你就知道他们的反应。而且，不用猜，我也知道，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世界上就真有这么好的事，而且就发生在中国，就发生在中国那场文革当中。我，还有我的同学们，就是活着的亲历者。下面就是我要讲的故事——一个小学生如何成长为不是工农兵的工农兵大学生。当然，这要从半个世纪前的 1966 年开始讲起。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明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
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都将直上天堂，我们都将直下地狱。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 查尔斯·狄更斯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 年的初夏，武汉的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暑假要到了。那时我是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正在准备报考中学和中学入学考试。每个学生可以填写五个中学的志愿。我的头两个志愿是作为省重点的一中和二中。不过，暑热中，已经隐隐约约闻到文化革命的味道了。

早在 1965 年底，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开始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作为小学生的我，对文革的来临当然毫无察觉，正如我们的父辈一样。

1966 年 4 月，《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那时候的我们还小，哪里读过他们的文章啊。现在真想看看他们当年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的文章。我脑子里仍然记得，当时跟在别人后面喊“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姓本来是一家”，那种屁颠屁颠“革命者”的情景。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被称为“五一六通知”），指出党内、政府里和军队里混入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份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不管我愿不愿意，理解不理解，我，还有全中国的人民，都被卷入了文革的洪流。自此，天下大乱。

我所在的小学里也动荡起来。学生们开始“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的“大鸣大放”，就是照搬报纸上的宣传，批判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被罢官的“海瑞”，还有那个不知道是怎样反党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我们的“大字报”，就是把课堂上临摹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的“真迹”，发挥到大白纸上，铺天盖地地贴满教室和学校楼道的墙壁。我们的“大辩论”，就是质问老师和校长，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旧”的教育路线，把我们“革命小将”培养成为俯首帖耳的“小绵羊”？老师和校方如果辩解，我们就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这是首文革早期流传很广的造反歌曲。唱到末了“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还要在结尾处加上呐喊声：“杀！杀！杀——嘿！”以渲染加强气势。

在革命情绪逐渐高亢和斗争火焰熊熊燃烧起来时，那些平时在班上受老师“迫害”很深的小将们，就会情不自禁地给老师带上纸糊的大帽子，像土改中斗地主那样，把他们拉到台上“坐飞机”。那些小将们甚至会动手打老师，剪女老师的头发，让她们变成牛鬼蛇神。在小学，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乖乖的好学生。低年级就被老师勒令停学，高年级因为不服管教，被老师精心用“保甲”制度围困。我也是苦大仇深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的被压迫者啊。但是，我的革命和斗争还是不够彻底的，只敢在台下喊口号，或者用满墙的大字报来宣泄革命情绪，却不敢公然上台打老师。

在这种翻身做主人的革命气氛中，一反六年来坐在课桌后规规矩矩听老师讲课的被“压迫”状态，真是大快人心！还有谁会有心思去复习什么功课，准备中学考试呢？

停止招生不上学 废除考试闹革命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为了彻底搞好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充分准备实行新的招生办法，决定将今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

大学和高中，“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招生“推迟”半年。实际上，何止是半年。这一推迟就是四年后的1970年了。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学和高中招生都“推迟”了，中学还“考”个哪门子的“试”啊。于是，中学的入学考试废除了。我们被革命解放了！

我是怎么上的幼儿园，三岁的事儿，我就不记得了，1950年代，想必那时候还没有必要对三岁的孩子进行考试吧。我进入小学肯定是没有考试的，因为我们幼儿园“毕业”后，统一分到附近的小学。1980年代出国前，我为了把女儿从武昌寄养在汉口的姥姥家，给女儿办理小学转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IQ的考试了。不知对那些孩子们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

中学入学考试废除，自然是皆大欢喜。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而言，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万一考试不及格怎么办了，反正都可以上中学了。但是，对于班上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他们信心满满地准备考个好的中学，显得好像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可能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机会，废除考试，反而是“剥夺”了他们可能成为精英的机会。

对我而言，一个中等偏上的顽童，其实是无所谓的。那时，只要不考试，就是好事。虽然曾经自不量力地填报武汉市一中、二中（当时的省重点学校）、武汉实验学校（当时的市重点学校）、武汉市二十中（就近的普通中学）。但是，考试未必就考得上。那是在学业面临的第一次“大考”，既然有不用考试就进入中学的“免费午餐”，不吃白不吃。

怎么分配这批小学毕业生呢？考试“废除”了，就没有标准来分配不同学生到不同学校。有一个简单“公平”的办法，就是用“就近入学”的原则来分配。革命了，不管学习成绩好坏，大家都一样“平等”，统统分到离家近的中学里。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一个根本就没有填报的学校——“三阳路中学”，连个武汉市第几中的番号都没有，就像一个民办中学。不仅如此，此学校还有一个颇不文明的雅号“三阳路，粑粑臭”中学。因此，学校在文革中一度改名，具有一个响亮的革命名称——“前卫中学”。原来，“免费午餐”是不好吃的。

我有个邻居发小，我住在三楼，他住二楼，从小一起长大。我俩在幼儿园就是同学，小学也在一个学校。只不过我们不同班，我在一班，他在二班。回到家，我问他分到哪个中学， he 说是“前进中学”。我想不会是他把“前卫中学”说错了吧，再问了一边，才确信 he 说是“前进中学”。那“前进中学”以前是什么中学？原来就是我想报考的第一志愿：武汉市一中。我就奇怪了，我们是同校同学，并且同住一栋楼里，“就近入学”应该到同一所学校才对啊？一中跟“三阳路中学”的校址是南辕北辙，而且一个在江汉区，一个在江岸区，隔得远着呢。为什么他“就近”往上到江汉区，我却“就近”往下到江岸区？“前进”、“前卫”虽一字之差，一个是省级重点中学，一个是不入流的类民办中学，相差得可以用“十万八千里”来形容。

这到底是怎么个“就近”入学呢？虽然，我那时候年纪尚小，可是也知道这个一字之差的区别，将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差距。革命就是这样“平等”的吗？这里面似乎有什么不对呀！

察举上品无寒门 征辟下品无世族

文革考试“废除”的弊端，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中国的不考试选拔制度，起源于汉代“察举”、“征辟”制。其中“察举”由地方长官平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征辟”是指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所谓徵，即皇帝征召；辟，即各地官府的官员招聘。

中国的考试选拔制度，科举考试，始于隋朝，发展并成型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是历时千年的主流选拔制度。清朝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就是通过描写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刻画了一个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其中印象颇深的倒不是范进，而是他的丈人胡屠户。话说范进中举后，乐极生悲，疯疯癫癫跑了。众人叫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让范进清醒过来。胡屠户一个嘴巴打将去，范进晕昏倒地，醒来竟不疯了。这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继而心里不免有些后怕：“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

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文曲星”这个词。中国古代传说中，文曲星是主管文运的星宿，文章写得好而被朝廷录用为大官的人，就是文曲星下凡。民间传说的文曲星有：比干、范仲淹、包拯、文天祥、刘伯温等。

我楼下的那位发小的父亲，就是一颗“文曲星”，时任武汉市教育局局长。人们自然觉得，他的孩子进入了省重点中学，跟他“主管文运的星宿”的职位和权力不无关系。记得在分配前，我亲眼看到我们小学校长，到楼下的“文曲星”家中来访问，想来和此事应有关连。还有另外一件事我也记忆犹新。我另一位同学，开始跟我一样分配到“前卫中学”。可是，后来他母亲坐着三轮车，气呼呼到了我们学校，对着校长大吵大嚷一番。于是，我的这位同学就分配到江对面的省重点“湖北省实验中校”了。原来，他家是老红军，是颗“武曲星”，是文革里面响当当的“红五类”。

由于没有考试这个所谓“公平”的独木桥了，因此，分配就完全由掌权者“文曲星”们决定。我们当中还有少部分同学“就近”分配到了其它重点中学，听说是由班主任老师推荐，学校分配的。就跟“察举”制一样，由地方长官（班主任）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学校）批准。这样一来，文革废除了千年的考试制度，但是文革的初衷——“人人平等”，实际上就没有了。班主任老师的看法，或者校长的看法，就可以决定一个学生是否可以进入好的学校。更有甚者，那个评价学术水平的评分标准没有了，中国又回到了古代传说中“文曲星”和“武曲星”的神话。这里，我还没有谈及其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好学校，而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那些人。

由于我在班上是个调皮的学生，不是班主任喜欢的那种“小绵羊”，因此分配到一个“粑粑臭”的学校，也是“活该”。但是，这就把一批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耽误在中学这个起跑线上了。比如，同时分到我们那个中学的，还有小学班上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大队长。他在三年级就当上了少先队的大队长，一直优秀到小学毕业。不过，我很庆幸分配到这所中学，跟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度过了我文革的中学时光。慢慢地，我开始从这个环境和氛围中体会到，社会上什么叫“平等”，什么叫“特权”；什么是“寒门”平民百姓的忍气吞声，什么是“世族”少数人的趾高气扬；开始理解平民在法国大革命中对贵族所谓的暴力和残忍的根源，和文革中造反派把“当权派”打倒的动机。

再品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句话，不禁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破旧立新红领巾 造反串联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游行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那时叫“接见”）。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有人说：红卫兵运动靠的是国家补贴。全国大串联中，红卫兵吃住不花钱，以及毛泽东1966年连续八次接见超过一千万红卫兵。虽然我对一千万这个数字存疑，但是，这伙人确实起到四处煽风点火，把文革的火焰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的作用。我，何其幸运或者不幸，就是其中一员，受到了第四次接见。

1966年9月初，我上了中学。一切照旧，开学发了中学课本，开始上课，数学开始讲代数 $X+Y$ 。物理课讲杠杆原理，动滑轮改变方向、定滑轮省力等。英文教完26个字母，除了Good Morning以外，还教我们Long live Chairman Mao! 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没有多久，革命形式一变，全校师生就“咸与革命”了。学校和班级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也摇身一变，从一个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成为了毛主席的“红卫兵”。记得在回家得路上，我高兴得蹦蹦跳跳，左臂带着红卫兵的袖章，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当时共青团的团章规定，年满15岁的青年方可申请入团。我上中学后才满13岁，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我至少要戴到初中二年级。而红卫兵则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是中学生就行。

这样，外表上，我就是个双料的“红”人——一个旧式的红领巾，一个新式的红卫兵。骨子里，我就是个13岁的小屁孩，不知道“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只想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我想像海燕般叫喊着，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和“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革命”开始是“破四旧，立四新”。记得首先是剪辫子，当然不是剪大清朝的辫子。记不得为什么要将女生的长辫子剪成短发，但是当时革命就是那样要求的。先是在学校里，让那些留长辫子的女生剪成短发。然后，就上了大街，看到路人如果留长辫子，就拦下来，让她剪掉。记得有次在电影院门口拦截，据说那里进出的人多，“四旧”也多。果然有个留长发的女生，我们一群“红卫兵小将”将其围住，勒令剪辫。她还不愿意，后来被强行剪掉大辫子才放走。走的时候，哭哭啼啼的样子，至今还在我眼前晃荡。

这些，就是我们当初部分的“革命行动”。幸好，我们之前的革命者，已经革了“三寸金莲”的命，我们只是“继续革命”而已。否则，我们可能还要对付那些又臭又长的裹脚，去解放天足。革命还有抄家活动，把资本家里的字画、“封资修”的书籍，在革命的烈焰中付之一炬。今天回想起来，多少前人保护的珍贵遗产，多少古玩字画历史记载，都葬送在文革的幼稚和狂热里。黑夜里，燃烧的灰烬在星空中飞舞，把一颗幼稚的心融化其中，在冷却过程里变得冷漠、粗糙和坚硬。

9月下旬，满13岁就接到通知，到北京去“大串联”。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大串联刚开始时，火车站的秩序还好。直达北京的火车，每个人都有座位。火车上的车窗是上下开的，开关在两边，而且要同时按下两边的开关，才能将车窗开启或者关闭。记得关窗时，车窗很重地滑了下来，不小心把一个同学的手指压肿了，这是革命付出的第一个代价。火车是夜里走的，因为兴奋，加上头一次坐着睡觉，所以很多人都睡不着。第二天看到黄河，那条中华民族的摇篮，默默看着这群人飞驰而去，就像千百年来无数来去的过客，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那感觉，就像今天在卫星上观看地球，人类在宇宙中是多么渺小。我们只不过是“小小寰球”上“几个碰壁苍蝇”而已，却“蚂蚁缘槐夸大国”，要去做些“蚍蜉撼树”的大事。

天安门国庆游行 毛主席北京接见

到了北京，真的吃住都不要钱。我们住在西城区南礼士路，儿童医院对面。那是一个国家部委单位，一个五层楼的建筑。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铺。早饭是馒头、稀饭和咸菜，北京人叫“粥”和“疙瘩头”。白天我们出去革命串联，食堂给我们准备了“火烧”和“鸡子儿”。火烧是一种类似我们南方烧饼的烤饼，鸡子儿就是鸡蛋。火烧里面卷着芝麻酱，热着吃还行，冷了就结实得咬不动。不过，碰到红卫兵小将革命的钢嘴铁牙，不管是鸡子儿还是火烧，都得败下阵来。

我们参观了文革发祥地“清华附中”，听那些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红卫兵小将作报告；到北大和清华看大字报，听大学生作报告；参观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还参观了故宫和动物园，当然不是动员那些古董和动物们，也参加到我们造反的革命队伍中来，而是在故宫了解时间的纵轴在200年前是怎么标记和沉淀的，在动物园体会在地球这个空间的横轴上，不仅有人类，还有跟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颗星球上各种奇异的动物，以此拓宽和纵深我们视野，让我们联系到今天的现实。在这里，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翻开第一页的第一段，就是在北京学会的，至今也不会忘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还记得串联时，高年级的学生作为我们的指导员，教我们学习“湖南农名运动的考察报告”，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接触到的革命教育，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温良恭俭让”这个词。“革命就是暴动”，而且革命就不能有儒家倡导的孔子五种美德：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

然后，在驻京部队的军营练习正步走，进行队列训练的集训。我们要参加十月一日国庆节游行。这对我来说，太“鸡冻”了。武汉中山公园的国庆节游行，对童年的我来说，那个阵势是十分震撼的。这次，我也要参加国庆节游行了，而且在北京天安门。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国庆那天一大清早两三点钟，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头等待。北京早晚的温差大，十月的早上冻得我们穿着毛衣还流鼻涕。不过，到了上午，太阳下面，又热得不行。再加上游行，走出了一身大汗。

十点钟，庆典开始。先是林彪的国庆讲话，他那一口乡音，让我们湖北人听得很亲切。除了林彪，朱德等军人外，好像其他那些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等，都穿着军装。唯有毛泽东没有穿军装，穿的是平时那身银灰色的中山装，或者如港澳台胞所讲的“毛服”。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片绿军装中，显得高大和突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毛本人。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的时候，大家开始正步走，都想慢一点，多看几眼。结果一过天安门，队伍就开始追赶前面的队伍，一路小跑，不时看到地上失落的鞋子，想必是前面的人鞋跑掉了，却来不及回头捡。

当晚，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度过的。我们进入天安门广场，被安排坐在纪念碑前的水泥大方砖上。烟花发射就在纪念碑下，我看着战士们把一箱箱的礼花放到发射机上，按下发射钮，那些各式各样的礼花就飞到了天上，在空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和色彩。还有一个带着礼花的小降落伞徐徐落在我们位置旁边。毛主席也在金水桥那边跟我们一起观看焰火。那天实在是太累了，一大清早就起来的，在节日的气氛中一直兴奋到晚上。不知不觉在烟花怒放的国庆之夜，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睡着了。当时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我会躺在在美国首都的广场上，观看华盛顿纪念碑上盛放的焰火。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这里将会洒上学生们的鲜血。

南下株洲拜韶山 翻窗卧底只等闲

1966年10月，从北京回来后，天下就更加大乱了。不上课了，那闲着干什么呢？干革命！既然从北京带回了“革命大串联”的火种，那我们就要让这把火烧起来。由于有了北京串联的经验，我们以各个班级组成独立的战斗队，然后就开始了我们自己组织的大串联。那时候北京来的红卫兵，都叫南下战斗队或者兵团什么的，所以我们也决定南下。

这时候的火车，跟我们当初北上之时，不可同日而语。就跟天下大乱一样，根本没有秩序。火车站上乱糟糟的，每个门口都挤满了人。没有办法上，我们只好派几个身手利落的，先从窗口往里爬。然后占据有利地形，在窗口接应。车下面推，车上边拉，好不容易翻进车厢。上车后根本没有座位。两个人的座位挤了三个人，三个人的座位则地挤了四个人。就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车上不要说查票，走路都困难。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挤了进去。

爬上车后，挤出一个立足之地，我们把背包往过道上一放，就坐在背包上了。就这样腿伸不直，也睡不着觉地坐到了晚上。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干脆卧底，钻到椅子下面的空挡里，在别人晃来晃去的臭脚丫子下入睡。或者，爬到行李架上，躺在别人的行李上睡觉。只要在梦中不摔下来就行。还有一招，就是在人堆里挤出一条通往厕所的缝隙，进去后关上门，终于可以舒展一下束缚已久的手脚身腰。方便一下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这里“享受”一下宽敞的空间。虽然里面的味道不是那么“清爽”，但是打开车窗就好多了。

后来，陆续在一些电影里看到过类似的镜头，似乎都没有拍出我们当年那个拥挤的“味道”。那些导演肯定没有我们当年的实战经验，真应该聘请我们去作文革镜头顾问的，哪怕就发个盒饭，免费都行啊。直到近来，看到每年春节期间的民工潮，那个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的阵势，才感觉到，真是长江后浪拍前浪啊！一点儿都不比文革差。当然，要是跟印度人民坐在车厢外面的顶上，那我们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1966年的时候，还没有从武汉到上海的直通列车，要么往南到株洲转车，要么往北到郑州转车。哪里像现在，从武汉到上海高铁最快4小时左右就到了。因为我们上次到北京途中，经过郑州，还买过河南的烧鸡吃，所以，我们这次走南线。乘京广线南下，中转站就在湖南的株洲。株洲是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之一，素有“南株北郑”之称。是仅次于省会长沙的湖南省第二大城市。历史上，株洲曾经是湘潭县的一个镇。而湘潭县就如“浏阳河”歌中唱的那样：“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

株洲市，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知道从这里出发，离毛主席的故居韶山很近。坐汽车一天可以早去晚归。于是我们在这里乘汽车到韶山，去瞻仰伟人的旧居。韶山冲树木葱茏，一块水塘边上，立着一座普通的农村民居。这里远离城市革命的喧嚣，除了那些参观者臂膀上鲜红的袖标，还是像半个世纪前那么平凡，那么安静。看不出这里曾经孕育着那位今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人的迹象。

迄今为止，我一共到韶山去过三次。第一次是自己要去的，充满了朝拜的热忱。第二次是上大学后，学校组织去的，是受教育去的。第三次是文革后，纪念入大学四十年，回顾历史去的。韶山冲山水依旧，草木茂盛。只是多了些市井气息，满大街都是毛氏红烧肉的招牌。今日的喧嚣替代了往日的安宁。不知道是否这就是当初伟人投身革命的初衷？

东进闷罐赏西湖 飞撒传单闹上海

株洲的串联接待站没有给我们弄到直接到上海的车次，却给我们一个在杭州转车的通行证。到了车站一看，是一列装货的闷罐子车。就跟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乘坐的一样。上去一看，车厢里位置宽大，不仅可以坐，还可以躺。而且，车上的人比客车车厢要少多了。于是大家就上了车。一路宽松舒适，有超过软卧车厢的感觉。真是世事难料，因祸得福。

只是闷罐车上没有卫生间，临时用两只带盖的马桶代替，红卫兵们就在那里自行方便。不久，革命的味道就开始在车上蔓延。我们只好掂起脚来，把头靠近闷罐子车的栏杆口，一边看着列车飞驰过大地，一面呼吸那带有煤灰的“新鲜”空气。就这样咣当咣当，我们坐着闷罐车，驾着革命味道的祥云，到了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

我们是清早到的，转车时间在中午。匆匆用过杭州的早点，我们赶到西湖边。杭州还没有完全清醒，草草一瞥慕名已久的苏堤、白堤和三潭映月，匆忙间不及拜访了。不过，总算是到此一游了。杭州本来就不在我们的南下计划中，此刻能站在西湖边上，看看淼淼湖水，默默吟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对于我们就已经够奢侈了。面对湖烟氤氲的西湖，“革命”不觉早已九霄云外。待到真正仔细地观看西湖风景，那已经是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了。别了，西湖！

上海，你好！我来了。经过株洲、韶山、杭州火车、汽车和闷罐车一路折腾，我们终于抵达上海，那个曾经叫做东方巴黎的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地方。由于所住的大洋楼离外滩公园很近，我首先去拜访了那个曾经令国人屈辱的外滩公园。公园其实很小，跟我的想象不符，也与其盛名不符。当然，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早已不在。出来后，我在外白渡桥上跺跺脚，振振臂，用典型红卫兵的姿态豪迈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时的上海，我印象深刻的有：举国第一高的国际大饭店，熙熙攘攘的南京路，还有城隍庙的五香豆。外滩，类似武汉的沿江大道，只不过稍微繁华一点。上海自来水很难喝，可以用难以下咽来形容。以至于回到武汉后，我竟然觉得平时无色无味的白开水竟然是甜的。平时，我们都不喝接待站的开水，只是早上把稀饭多喝一些。白天口渴了，就买冰棒吃，或者买汽水喝。大串联的北上和南下，开始充实我的舌尖词汇，例如：北京把冰棒叫冰棍，上海把冰棒叫棒冰。上海的冰激凌，是我在中国吃到的最好的冰激凌，没有之一。记得是一角五分一只。买时发一个木制小勺，用来刮纸杯里的冰激凌。如果问我，对上海有哪些舌尖上的回忆，我会回答：“忆苦自来水，思甜冰激凌。城隍庙五香豆，ABC米老鼠”。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借钟馗打鬼，用海派打倒京派而开始。虽然，上海是文革的源头，功不可没，但是，我们没有忘记红卫兵“南下”的历史使命——点燃革命大串联的烈火。上海接待站，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最好的一个。接待站除了提供食宿以外，还提供蜡纸钢板纸张等宣传工具。我打开北京大串联的笔记本，上面不仅有清华北大报告，还有校园里摘抄的革命大字报和传单。我在这里学会使用铁笔，并在蜡纸和钢板上写下了革命的檄文，批判“血统论”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张狂言论。再蘸上油墨，用滚筒印在花花绿绿的纸上。然后，把它们叠成两折，鼓鼓囊囊的装满书包。我们走到当时人最多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从楼上大把大把地往下撒。底下人头攒动，纷纷去抢去捡那雪花飞舞般的传单。就是坐在公共汽车上，我们也会从窗口往外撒传单，激动地看着车后奔跑追抢的人群。上海在沸腾！中国在沸腾！这就是革命，这就是大串联！少年的我们，此刻陶醉了。

访古都虎踞龙盘 驻炮校拜先总理

上海革命高潮尚在继续，然而，我们革命目的已经达到，且囊中羞涩，是该打道回府了。原计划乘船溯江而上，抵达武汉，但那时上海船票是一票难求，更不要说我们大队人马了。上海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们，可以先取道南京，然后从南京乘船返回。如同杭州是意料之外一般，南京之行也是飞来之喜。

南京，在我年幼的心目中是厚重，是沧桑，更是豪迈。谈到南京，首先想到是近代史，是那风雨飘摇中总统府的降旗，是那高高在上的先总理中山陵。至于南京柔美的一面，还是文革后得知。南京当年曾经是“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及至读了朱自清散文后，方知道还有夫子庙，还有“比北京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的“七板子”；还有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风光：“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

不过文革中的南京，是看不到丁点儿六朝烟月和丝毫金粉荟萃的。那是秋天的一个阴沉日子，灰色的墙上满是标语，大街骚动着像我们这样子的红卫兵。还没有看到绿色如茵的秦淮水，我们就被分配到南京炮校。行前仓促地浏览了一下南京市容后，我们就被带上去炮校的汽车。途中路过了南京总统府的旧址，那是一座三门八柱的大门，门楼上“总统府”三个大字和光秃秃旗杆风中犹存。不禁联想起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总统府降下旧国旗的那个镜头，以及那首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此刻，不就是踏着沧桑的人间正道而来吗。

南京炮校是个军队的院校，校园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大炮，令我惊讶。我们跟接待站要求参观雨花台，那个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地方。炮校的同志说，他们的车不顺路，但是可以顺路带我们参观中山陵。于是在送我们去南京码头的途中，我们顺路拜谒了中山陵。

高高拾级而上的白色石阶，是中山陵给我最深的印象。仿佛攀登八达岭那样，在石阶爬了好一阵子，方才到达上面。一座蓝色屋顶的纪念堂巍然矗立，内有孙中山白色石像，让人联想到蓝天下的白云。中山陵的游人很少。我们依然尊重国父，是在他的奋斗之下，我们废除了中国最后一个帝制，走向共和。国庆节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正中，跟毛主席相互遥望。但是，此刻中国“革命”的意义，跟孙中山讲的革命，已然不同。1966年的台湾，蒋中正还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地继续反攻大陆。而我们大陆，正在进行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我继续革命。十年之后，蒋毛二公相继去世。面见国父，两人是否会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是继续革命永不休呢？

乘坐江轮，也是我开天辟地头一遭。虽然我们是五等舱的席位，但是我们每人都领到一领席子，可以在大统舱或者走道上睡觉，比火车好多了。轮船不仅内部空间大，还可以在甲板上呼吸清新的江风。不由得在船上感怀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事情总是乐极生悲的。忽然觉得身上奇痒难熬，我们身上出现了虱子。在武汉，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小虫子。经过分析，在上海时，我们曾经和东北来的一伙红卫兵睡在一起。他们因为身上有虱子，所以睡觉都光着身子。我们那时不懂得虱子也是会“串联”的，于是躺着中枪了！后来在内衣的缝隙里发现一些白色的小圆点，据说是虱子的幼虫。我们一伙人躲在船舱里，脱下内衣，找出衣缝里的幼虫，然后用指甲夹死。真是大煞风景。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到澡堂洗了个痛快。脱下全身衣服，用开水煮烫，才彻底根治了虱子。

造反派变保守派 红卫兵成反革命

1966年11月，正当我摆脱虱子的纠缠，“好了疮疤忘了疼”，又蠢蠢欲动，准备西征到大西南时，中央文革下达了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动荡中的中国终于喘了口气。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这时候，全国基本完成从中央到地方揪出走资派的过程，各级地方组织瘫痪。学生依然不上课，或者在社会上流荡，或者参加所谓“夺权”的造反派和“保皇”的保守派，形式更加混乱。

1967年1月，“一月风暴”。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和策划下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造反派矛头直指各地省委和军区。短短几个月内，我们红卫兵迅速被打成“保守派”。我们开始也是要革命，要造反，要打倒“封资修”和“牛鬼蛇神”的，怎么就成了保守派？几个月前，我们还叱咤风云，现在一下子就被入了另册。思想上实在转不过弯来。文革初期由学生出面“造反”，把天下弄得大乱，现在要收拾残局，以求天下大治，我们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1967年2月，“二月逆流”。对于“一月风暴”，军队和政府的老帅老干部（所谓“三老四帅”），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联手反击中央文革“大闹怀仁堂”，发生了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二月抗争”。据说谭震林竟然讲：“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是，毛泽东表态支持中央文革，老帅老干部被批判。由此，国家走向造反派全面夺权和全面武斗的失控态势。此为党内军内的第一次“抗争”。

“二月抗争”失败后，各地纷纷揪“谭震林”。武汉造反派要揪“武老谭”，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大麻子”——陈再道。我们这些红卫兵是支持军队和政府的，工人当中也有许多人持这样的观点。于是这些红卫兵和工人联合组成“百万雄师”的组织。军区和省委当然也支持“百万雄师”，反对要夺取他们权力的另一派。这样，两派群众就对立起来，由开始的口水仗“文斗”升级到武装冲突的“武斗”。那时我还小，14岁还不到，就这样卷入派性的斗争中。

1967年7月，春去夏来，武汉两派武斗持续升级。中央文革派人来解决，下马就发表了支持造反派的讲话。“百万雄师”群众在当地驻军支持下，乘坐军车在武汉三镇游行三天，围攻连中央文革派来的谢富治、王力，并将王力都打了。听说毛主席当时也在武汉，见事态不好，乘飞机走了。他从来都不坐飞机的，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可见事态之严重。这就是轰动全国的“720”事件。中央文革迅速表态，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为了迅速打垮保守势力，直升飞机到处撒传单：“中央文革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一时间，武汉上空乌云滚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完成了从革命小将到反革命的过程。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从驻守的“百万雄师”据点撤出，藤条帽和长矛（早期武斗“武器”）四处凌乱堆放。眼里含着眼泪，口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们委屈，我们迷茫。明明是拥护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怎么就成了“反革命”？我们不懂，工人不懂，军人不懂、老干部也不懂。其实，造反派未必就懂。

且看历史：王力——720回京不久，就被毛主席批示：“是坏人，是小爬虫，立刻抓起来”。谢富治——作为老干部，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陈再道——文革后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我——当年的红卫兵，在大洋彼岸回顾和思索那段“革命”历史。

闹武斗头破血流 走为上老家寻根

再后来，就是“红色恐怖”，轮到 we 被造反派批斗了。记得我哥哥（66 届初中生）被学校的造反派骗到学校，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时，父母亲都被打倒，进入牛棚去改造了。回到家里只有我一人，我陪他到附近一个小医院去治疗。医生说伤口太长，需要缝针，但是没有麻药。剪掉伤口周围头发后，医生就直接在头皮上硬缝起来。我哥厉害，挺着不叫疼，我却心疼得眼泪都流了下来。父母知道后，赶紧让我哥回到老家农村去暂避风头。

革命形势越来越严重，各地武斗愈演愈烈。仅举二例：1967 年 7 月至 9 月间，在重庆地区发生一系列的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在徐州发生的武装冲突，动用空军飞机和陆军的坦克，其中卡车 450 辆，步枪 1.4 万支，长矛五万支。如今，那些在电脑和游戏机上玩战争游戏的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半个世纪前，在共和国，在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陆海空三军的“杀人游戏”，但是，那是真的要死人的。幸哉？悲哉？

“720”事件的后果是，据记载，湖北全省受牵连被打死、伤、残的官员、军人、平民 18 万多人，武汉当地被打伤打残的有 6 万多人，600 多人死亡。而据美联社统计，美国伊拉克一场战争导致 3 万多名美军士兵伤亡。文革中，仅仅一场武汉局部事件引起的伤亡，就比一场战争的人数还要多。几十年后，据说那些劫后余生的“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头头们聚在一起，曾经的对头在历尽沧桑后，“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可是，那些伤残者和冤死的亡魂呢？

冥冥之中，我看到了郑义（我在美国认识）所写“广西吃人狂潮真相”。回想鲁迅在其小说《药》里所描述麻木的老百姓蘸着革命党的鲜血馒头时，他警示当时国人的愚昧无知，不了解革命的真义，并且以此说明当民智未开的时候，革命并不是救国良药的用心。我发现，我哥在武汉“挨打”，真是幸运。要在广西，小命呜呼不说，恐怕连肉都吃了，骨头也啃了。在神州大地的某些“民智未开”的地方，人性底线已失。除了残杀，还有相食。这段往事丑恶，沉重，不堪回首。

接下来轮到我了。造反派给我发来通知，要我去接受“批判”。有前车之鉴，我才不上当呐。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之乎也，跟我姐一道回了一趟老家。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安国县，素有“药都”和“天下第一药市”之称，看过电视剧“大宅门”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回老家，也是唯一的一次。不知道此生是否还有机会再去老家看看。

我的老家，是河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我在那里看到父亲曾经住过的房屋院落。那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环绕着我。我第一次接触到老家的黄土地和真正的乡音，看到北方的四合院，看到院子里的枣树，看到纸糊的窗户和窗花，看到厨房做饭的灶，看到卧室里烧着炉子的土炕，看到村口用轱辘打水的井，喝过略带盐碱的井水。那是一个跟我当时居住的家，武汉市洞庭街 70 号（原李凡诺夫公馆），截然不同的天地。乡亲们热情地迎接我们，讲着我不太听得懂的河北方言。我躲在文革暴风雨中那段短暂的平静里，偷偷看了很多旧书，诸如“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儒林外史”等等，开始了解中国的过去。老家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没有革命、造反、武斗，却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在城里批判过的“四旧”。那是一个无论你在外受了什么委屈、磨难，都可以回来舔血疗伤的地方。在这里，我第一次产生了“根”的感觉。

诚所谓世事难料。我因为“大革命失败”了，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却知道了老家意味着什么。福兮乎？祸兮乎？

复课革命返学校 逍遥社会在人间

1967年，是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造反、保守，夺权、复辟，武斗杀人、隐世避祸，混乱中，我被踢出了革命舞台，就跟在1966年卷入文革一样。《红楼梦》里有段《好了歌》，甄士隐如是注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一年，我在“阶级斗争”的课堂中，迅速成长。我体验到了有些人一辈子都可能遇不到的东西：革命与反革命，成功的激情和失败的沮丧；一下子从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我在迷茫中开始思考，在混乱中开始早熟。

1967年10月，我相当于初二。《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从北京下来。自此，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是回到教室后，社会还在动荡，人心依然涣散。学生们以“读书无用论”来批判老师“师道尊严”，根本没法上好课。既不能上课，又不能革命，咱就做个逍遥派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于是我们一伙小学要好的同学就常常聚在一起玩，在社会中学习。就像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人生三部曲》中第二部《在人间》一样。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河里的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在学习“外国民歌二百首”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识简谱，扫掉了小学音乐课“音盲”的尴尬。开始学习乐器，吹口琴、拉二胡、弹吉他。“少年强则国强”，梁任公的这段话，在我们从少年转入青年之际仍然激励我们。清晨在江汉关的钟声里，沿江大道上传来我们劈里啪啦的晨跑声。又或江轮上我们纵身一跃，劈波斩浪于万里长江，身随滚滚江涛任其沉浮。

更有到邻居家“窃书”来看，通过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开始了解苏俄文学，并且通过他们开始接触狄更斯、巴尔扎克、果戈里等人的欧洲名著，逐渐打开了我狭隘的视野，心中的人性开始苏醒。1967年底，就这样从手指间悄悄流过。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在某些方面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写照。只不过把北京什刹海上溜冰，换成了武汉长江里游泳的镜头。

当然，我们也会偷尝禁果，偷偷在一起抽只烟，喝点酒，打打扑克，玩玩梭哈。有次玩到夜里很晚，突然一伙警察破门而入，将我们以“聚众赌博”而抓起来，带到派出所一番讯问。当我面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时，才首次感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虽然是虚惊一场，不过，事后我们跟这些警察反倒成为朋友。

当然，这与北京张郎郎（我在美国认识）真正的蹲监狱判死刑，以及他的狱友遇罗克被枪毙，又不是一个级别的故事。郎郎虽然生于延安中央医院，在“马背摇篮”里长大，但是他一口京腔，地道的北京人。郎郎是属于那种天生就会讲故事的人，天大的事，到了他嘴里都会不急不慢地道来，如《文革死囚-张郎郎》。现在，郎郎又开始讲故事了，大伙儿不妨有空听听。

1968年7月，不觉夏季来临。伟大领袖发出“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随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各高校，学校的混乱开始平静下来。

1968年9月，我相当于初三。当局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天下大乱，终于趋于大治。

文化革命庆胜利 干部学生齐下乡

1968年，形势开始好转。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革命车轮仍然滚滚向前。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一、1968年10月，“五七干校”。“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伟大领袖对干部发出号召。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十年后的1979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在此期间，我有许多同学和朋友也跟随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干校继续他们的中学生涯。我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就此不同。那时，我父母都已经“靠边站”了，任子女们在社会上“逍遥”。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们家没有下放到“五七干校”，没有获得“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现在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二、1968年12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伟大领袖对学生发出号召。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学生们回归正常生活，但是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直到1968年暑期，又是毕业时候，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也不招工。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我的姐姐就是这样上山下乡，到了农村。这场运动规模之大，影响至深，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当年的“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即便后来，我漂洋海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居住，那里也有“华盛顿中国知青协会”，而且活动频繁。每年我们都会一起四海漂游，世界各地都留下我们这些当年“知青”的踪迹。

即使跟我同龄的“发小”们，有的也赶上这波大潮。因为他们当初就读的是苏俄当年试点“十年一贯制”的小学，五年级就毕业了，考上了中学，所以他们是68届的初中生，赶上了下乡。我本来也是分配到同样的试点学校的，但是阴错阳差地换成普通小学。看着他们佩戴中学生校徽，我还着实的羡慕和懊恼了一年。但是，正因为失去68届的机会，才碰到了69届部分同学不下乡而上了高中。所以，当机遇跟你擦肩而过时，不必羡慕和懊恼，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机遇是否更好。

最近，看到一些有关我们69届知青的文章，说我们是最特殊的知青。我们这一批人没有上过课就轮到下乡，等到恢复77年恢复高考，知识却还在小学程度。从知青角度出发，69届知青是迷失在老三届（66、67、68）和新五届（70、72、73、74、75）之间一批人的“特殊”知青。而我，以及和我有一样经历的极少数69届学生的故事，又是这个特殊的群体中的“特殊”。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话，这是当年，作为年轻人的我们，经常挂在口上的豪言壮语。岁月的流逝中，我们不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人们早已淡忘了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的岁月，还有我们的故事，在习近平之后，将会在如烟往事中，渐行渐远。

淡忘之后谈遗忘 特殊之中道奇遇

作家王安忆在她的小说《69届初中生》描写我们的遭遇是：没有老三届的文化功底，考大学无缘，也不像更年轻的人，可以拥有新的机遇；在街道小厂做工，面临着精神的苦闷和危机。特殊年代的奇特遭遇，在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在感情上留下感慨和唏嘘。这些故事，是社会的现实，也是我周围的同学的境遇，的确是我们那一批人的真实写照。

文革开始大串联时，有个北京的69届哥儿们南下，途径武汉，我们很谈得来，于是成为朋友。三年后的1969年暑假，初中毕业之前，我在北京度过建国后的20国庆。正逢他要上山下乡到东北黑龙江去。记得我们北京站一别，他说出一句话来：“风萧萧兮易水寒”，那份离开京城、离开父母、离开家和朋友的悲凉之情，深含在他的眼中。如果在三年前，我恐怕不知道这句话的典故，更难以体会他此刻的心境。但是，我已经不再是1966年那个高举造反大旗，幼稚懵懂的红领巾+红卫兵了。我知道下面一句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虽然，我非燕太子丹，他非荆轲，我们相别也不在易水，更没有高渐离击筑，只有列车的轰鸣，但是，我们能相互体会到那无奈又悲壮的决绝之意。况且，“回首生死两茫茫”，今日我送他，焉知明日送我是何人？

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但是我不是“知青”。我没有“上山下乡”，而是继续升学上了高中。

其实，这也不是几个人的特殊个案，而是一批人。他们至今还健朗在中国的大地，或是如我，漂泊在世界各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只有少数人，包括我的同学，还在继续工作，当然已属凤毛麟角了。

这里并不是说，是由于身体原因，或者是走后门，我才没有“上山下乡”。而是文革中随着《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炎黄子孙的这块国土上，有一批人“暗箱操作”，力反“上山下乡”的潮流，开始恢复文革高中的招生。“老三届”上山下乡了，城里只剩下我们69届，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如今我在海外，孤陋寡闻，似乎没有看到研究文革的人对此有专门论述或者只言片语的描述。或许，我这段短小的文字，能够在万马齐喑中，带来些九州生气？

1969年初，文革的大动乱已经平息。权力的洗牌接近尾声。在准备跟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时，我们接到通知，从69届毕业生中，要直接招收一批学生升入高中。我们湖北省如此，其他省份肯定也有。听说南方的一些省份也有69届毕业生直接升入高中的。北京、上海两地倒没有听说，估计是天子脚下和文革发源地，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之故吧。

招生的比例是20%。也就是说一个50人的班上，有10位同学可以上高中。因为这时高考还没有恢复（虽然正在紧锣密鼓之中），招生的办法仍然是“察举”“征辟”推荐制。所不同的是，这是自下而上的推荐。先由学生投票提名，然后老师推荐，最后是学校决定。经过这三道关卡后，我们班产生10名上高中的同学，其中，就有幸运的我。我们那个“民办”中学就有120名同学被推荐升入高中。后来谈起当年进入省重点的那些小学同学，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几乎都没有升入高中。大概是重点学校的竞争太大？或者父母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又或者走后门去当了兵？焉知当年分配到这个普通中学，竟然从矮子里面拔出一个高个来。

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二次没有统考。直接选送进入高中。上了高中，又会如何呢？前面的路是喜还是忧？无人得知。

入高中百废待兴 提干部咸鱼翻身

1969年春，高一岁月。三阳路中学跟“武汉市实验学校”共150名的毕业生“就近合并”，成为文革中首届高中生。根据当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文革高中制定为两年。而且由常规的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以前的课本都被教育革命废除了，在新形势下现编了一套试行教材。把原来初中到高中六年的课程，压缩到两年时间之内。我们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外语和体育课以外，物理、化学、生物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基”。大家一开玩笑，就“公鸡母鸡”的乱叫。不过，从高中开始，我们才“恶补”初中知识，虽然吃力，但是我们努力紧跟老师的教鞭所指。

那个年头，还是在文革中。学生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学不久，我们就到湖北省蒲圻的“五七干校”去劳动。白天我们上山采茶，施肥杀虫，把采好的茶叶装到大麻袋背下山去。清晨和晚上还到广播站读报纸，念社论，表扬劳动中的好人好事。集吃、住、行活动在一起的茶厂集体生活，很快就密切了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那是我高中生活一段美好的记忆。

回校后，又赶上当时刮起一股“西北风”，全国都唱起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走上街头去唱“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不时的还要演唱革命样板戏，跳“忠字舞”。我天生缺乏艺术细胞，尤其不善跳舞。班里要我去唱歌跳舞，简直是要了我的命。我东躲西藏百般推却，想尽办法就是不去。不光是我，班里还有许多男生也是如此。班干部实在奈何不了我们，于是就报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就找我去谈话。谁想到，班主任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对我“委以重任”，提拔我做学生干部——管理军事体育的“副排长”。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过去的学生班级都升为“排”，我就相当于管文体活动的副班长。

不抑反扬，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自小学就调皮，历任老师都不喜欢我，批评惩罚是常事，我都习惯了。兼之我是顺毛驴，服软不服硬的主，破罐子破摔，谁怕谁呀。记得刚到实验学校，我头上一顶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卫士瓦西里戴的帽子。在校门口被执勤的学生造反派“红哨兵”拦下不让进，说是奇装异服。我申明说，这是工人阶级戴的帽子，无产阶级戴的帽子，革命者戴的帽子，为什么我不能戴。双方僵持不下，后来惊动学校领导，才放我进去。但申明，以后不允许戴了。我偏不听，一纸大字报《工人阶级的帽子为什么不能戴？》贴在校门口。终于，他们不再管我了。当然，我见好就收，后来就改戴解放军帽，就更无人敢拦我了。

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干部呢？因此，她是此生中几个让我佩服的老师之一。不在学术，而在育心，或者驭心。在伯乐前，野马驯服了。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我，一个在面对众人讲话都会脸红的人，硬着头皮上阵，逐渐把我们排的各项军体活动弄得有模有样。作为干部，为了全排，我还牺牲色相，去跟女生学习跳舞。我自己去跳了，班上其他男生也就跟着一起跳了。我还组织班里同学成立学习小组，不仅学习文化，也学习马列。一时间，我所在的二排，各项活动在全连风生水起，我也如鱼得水。大有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意思。

殊不料，泰极否来。1969年3月中苏在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紧张。林彪发了一个第一号命令，“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中央决定从上到下将一批领导干部疏散到外地。其蝴蝶效应就是，我家由武汉疏散到了鄂西的宜昌，我只好随家前往，我在武汉的高中生活就此结束。我的另一段高中生活将在湖北宜昌继续。别了，武汉，我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

镇境山心远地偏 三游洞世外桃源

1969 年秋，疏散宜昌。宜昌古称夷陵，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是长江三峡最后一峡西陵峡的出口处。抗战时，中国军队就是在这里抵挡住日本军队，保卫了重庆大后方，使得中国没有完全沦陷。现在是长江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水电站的所在地。当时的宜昌有三个名称：宜昌地区——辖九县一市，宜昌市和宜昌县分别平行，隶属宜昌地区。遥想李白当年，在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跟我们当年红卫兵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情何其相似。结果到晚年诗仙流放夜郎，其诗曰：“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刚到宜昌，环境大变，我颇有同感。不过，那时的宜昌已经没有造反和武斗，倒也有些难得的悠闲自在。

我们家被疏散到宜昌县的镇境山，山下共有四家“疏散户”住在那里。镇境山是座小山，山高不过百米。听说早年山上建有庙宇及楼阁，“坐镇江河处，雄撑楚蜀间”。由于它“镇一方之境”，故而得名。我们家旁绿树丛中，有一条蜿蜒小道抵达山顶。山上的庙宇经历文革“洗礼”，已经是一片瓦砾，唯有一座大钟尚存。捡山石敲击，钟鼎之声浑厚。放学回家，携邻家小弟，或者登山眺望，或者坐在山坡上吹口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斜阳西下，远处山峦起伏，江水如练。近处林木葱郁，教室、校舍隐约其中。大有五柳先生田园情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镇境山下有座学校：“湖北省宜昌第二中学”，时称“二高”，我就转学到这里。“二高”是湖北省十八所重点高中之一，据说升学率曾达 95% 以上。这都得益于师资雄厚，生源拔尖。我们语文老师讲课，文采斐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书本上没有的形式逻辑——三段论：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到推导结论。让我们脑洞大开。数学老师讲课逻辑严密，语言精练，深入浅出。让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学完”了中学六年的课程，虽然走马观花，却牢牢奠定了我的数学基础。命运鬼使神差让我在大学修的文科，但是我在美国留学时，修过数学和统计学的课程，都名列前茅，令我的导师惊讶。包括后来改行做电脑软件工程，我也从中获益不小。我想，都应该归功于这些老师的辛勤教导吧。

除了课堂学习，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很多。学工：参加宜昌东山火车站修建；学农：每周到镇境山上学校农场挑大粪干农活；学军：长途跋涉鄂西大山野营拉练。学习摄影，钻到床底盖着被子，充当暗房冲洗胶卷；学习乐器，拉二胡弹扬琴演奏“草原英雄小姐妹”；学习体育，打排球从零开始到参加校队成为主力二传手；还有周末休闲时，到南津关看西陵峡江水奔腾而出。这里没有那些校门口拦着我不让进的造反派，大家除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也在积极要求进步加入共青团。有少数同学甚至在高中入党，整个班级和学校处于一个正能量的态势。

记得有次大家骑车到不远的“三游洞”游玩，中午吃饭时来了点小酒，于是乎，有人脸红有人兴奋有人腿脚软无力，大家坐卧拥靠半酣中留影一张。我的那张照片，由于海外奔波多年，早已不存。最近同学们在微信上又翻了出来。真如白居易所作《三游洞序》：“酒酣，闻石间泉声……但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不禁长叹：“吾人难相逢，斯境不易得。”

1969 年 12 月 31 日，入夜，篝火在星空下熊熊燃烧。全校师生坐在校园里的操场上，聆听太空中传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东方红乐曲，还有广播里激动人心的“元旦社论”。记得社论中有“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这样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文字。在那个年代，让吾等学子们心潮沸腾不已。

物理数学回宜昌 英文绝密去北京

1970年，是我清楚记事的第一个“十年”。一个以动乱结尾的六十年代过去了，一个崭新未知的七十年代来临。这十年对我而言，孕育着人生转折的巨大变化，对中国，也是翻天覆地的十年。

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海洋中，有一阵子我们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暮鼓晨钟，书斋苦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在武汉第一学期学的是工基（物理），而宜昌第一学期和第二个学期教的时工基（化学），等于我工基（化学1）没有学，直接就进入工基（化学2）。因此我很吃力，虽然一阵恶补后，考试过关，但是我的化学基础从此落下病根。以至后来大学里学习岩石矿物成分时，一看那些化学符号，我就头大。另一个我不喜欢的学科是英文，老觉得背单词枯燥无味，哪有数学推理，物理实验有意思啊。为了加强我英文的弱项，我参加班级的英文小组，得到英语老师的课外辅导。我们英文老师姓谢，人称谢踢脚（Teacher），是武大外文系的高材生。为了提高我们学习兴趣，教我们在学唱国际歌中背歌词。这一招很灵，至今还记得：Arise ye prisoners of starvation. Arise y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he internationale shall be the human race!

紧接高中招生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出笼。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通过，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了“十六字”招生办法及“两个估计”，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虽然，明令从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跟我们没有上山下乡的高中生无缘，但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71年9月，林彪事件。正当我们进行队列训练，准备国庆游行时，传来了“九一三事件”的通知，国庆游行第一次停止。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我又茫然了。年底，举行了一次看似没有意义的毕业考试，我们毕业了。我们当中，一部分同学未毕业就到商校去“补充”财贸队伍了，剩下的同学自由组合，上山下乡。我们被分配到宜昌郊区伍家岗公社插队落户。去报到后，公社说，你们回去过完春节再来吧。接着，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上面下来一个通知，湖北省在应届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但是只招数理化加外语专业，文史哲不招。理由是上山下乡两年后，数理化外语都忘了，要试着“直接”在应届毕业生中招生。方法是班级推荐，学校批准，大学复审。

1972年1月，报考大学。我们二高应届生10个班，500左右学生。5%就是有25个人可以上大学呀。每个班级先推荐3名候选人，基数比5%的比例略微大一点。原因是考虑到政审和体检中可能会有不合格。通过全班评比、投票表决，我们班推荐了三个在毕业考试中成绩突出的同学，经学校核实，最后批准了，其中就有我。虽然我不是班干部，表现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的“运气”好！不喜欢外语的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一样，报了物理和数学两个专业。经过体检，我们班三名同学全部过关。当然我们班三个名额是基于别班不合格的同学，此刻，命运没有垂怜他们。

体检时，一个招生人员问我，愿不愿意去地质学院？那年头，只要能上大学就不得了啦，还敢挑学校？我赶紧回答说服从分配。他说地质学院是“绝密”英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北京地质部。如果报数理化，我只能上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按照哪来哪去原则，回到宜昌中学当老师。如果报地质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地质部当翻译。在专业和毕业之间，我选择了北京，这就意味着我要学那个我不喜欢的专业——英文。你说，人生，到底是命中注定，还是在于自我选择？

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三次没有统考。直接选送进入大学。宜昌，宜昌，莫非你真的宜于昌？

遇搬迁没头苍蝇 待入学好事多磨

或许有人问，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吗？我们宜昌那一届应届高中生，湖北省全部分配给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几个试点专业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和外语。我的两位同学如愿以偿，分别上了物理系和数学系，毕业后也都分回了宜昌。北京地质学院是个黑马，我在后面会仔细讲这个故事，要在湖北的宜昌地区、荆州地区和襄阳地区分别招收 10 名高中应届毕业生，一共 30 人，办一个英语专业，为地质部培养英语翻译。我能有两个选择，已经很够意思了。其他人甚至连选择都没有。我在武汉实验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同学中，当年有两名上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入学比例连 2% 都没有达到。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是响当当的“地派”，与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各自为政，不仅在北京，在全国都是“天马行空”和“掷地有声”的。1969 年林彪“一号命令”下达，不仅疏散干部，把我们家疏散的宜昌，也把我要上的大学从北京疏散到湖北。你说，这是什么机缘？北京一些重要机关和学院先后实施大转移。其中北京矿冶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大学相继搬迁出北京。抗战时期曾经就有北京一些大学外迁，后来成立西南联大。不过，这些学校从北京出来后，各自东西，经历各有好坏。五十年后，当年的北京地质学院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北京）两个校区，依然是国家重点大学。学长温家宝还出任过政府总理。

1970 年的北京地质学院还是个没头苍蝇，到处在寻找新的校址。从湖南一路找来，到湖北后发现大专院校很多，各个方面条件不错，因此，就有了在湖北招生办学一说。1970 年 9 月在湖北江陵县挂了一块“湖北地质学院”的牌子。我们的上届招收的二百多工农兵学员，由于没有校舍，只好分散在丹江和江陵地质队进行教学。1972 年春季招收我们时，还不知道在哪里上课。因此，决定推迟我们入学，真是好事多磨。该不会像文革开始那样，等着等着黄花菜就凉了吧。英文谚语说得好：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早知这样，还不如去华师呢，起码现在已经上学了。

在那段时间里，北京地质学院明里在执行迁校部署，暗地里一直想着回迁北京。迁校早期有文件说，外迁院校不得进入省会级的大城市，如湖北武汉，所以只有在地区级中小城市寻找校址。校领导先后到黄石、大冶、武昌、孝感、蒲圻、咸宁、花园、广水、襄樊等地进行考察、论证。其间，1973 年 3 月，邓小平复出后，开始纠正那些过左的决定。经过反反复复的形势变化，直到 1974 年，最后还是择优选址武汉市，并获得国家地质总局和湖北省批准。

在入学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干些什么呢？也没有闲着。毕业了，不能再呆在学校里。大多数同学下乡了。到华中师范学院的同学们也走了。宜昌二中剩下我们五位地质学院待命新生，同样命运的还有宜昌市一中四位同学，和宜昌市七中一位同学，共 10 人。宜昌地区共青团委员会把我们招集在一起，为他们做些编外的工作。那时大家都是团员了，其中还有一个学生党员。地区团委要我们到各中学的团委去，一是收集校团委工作报告，二是听取工作汇报了解各校团委的工作状况。那段时间，正值湖北省青运会在宜昌召开，我们作为大会服务人员，跟那些年青的运动员一起，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其他时间，每天清晨，我都会跑步到公园锻炼身体，学习华师外语系同学给我的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材。虽然心中对什么时候入学，没有着落，但是我要把日子过得扎扎实实的。

直到湖北省同意将武汉地质学校的教学点改为“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分院”，我们终于在 1972 年 9 月踏进大学的校门。命运，又悄悄打开了新的一页……

尾声

命运是严肃的，有时也喜欢看玩笑。这样，使的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丰富多彩。从小学到大学，一路绿灯，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升学大考。对于我，或者少数人来讲，是幸运。但是对于同龄人、其他人乃至国家，则是不幸。其实，人生每一次抉择、人生旅途的每一段转化，都是一次次的“考试”。好运气，只能给人带来暂时的侥幸。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可以通过那些“考试”。

具体到我，实际情况是：虽然大学毕业也没有考试，但是，此后人生路途上，却有一连串的考试，在等待着我。从工农兵学员“脱帽”的校级助教班统考到正规讲师评级的省级联考；从留学美国的托福考试、研究生入学的 GRE 考试，到研究院的毕业考试和学位论文；从谋生的房屋经纪人全美考试、金融理财证书全美考试，到 IT 微软软件工程，甲骨文数据库工程、网站开发等计算机全美专业资格证书等等，大小考试无一不是充满挑战。

回过头来看那些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跟进入社会后那些真正人生考试相比，就如同小儿科一样。命运是公平的，当我们为得到某些东西而高兴时，另一些东西又悄悄失去。与其去窃喜或者抱怨，还不如充实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老天赐予我们每个人一个独特的人生，本无好坏之分。不管处于何种环境，人生的好坏都取决于我们自己。你说，对吗？

至于我们这些“非工农兵学员”，在那个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环境里，是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毕业后，我们又是怎样背负者工农兵学员的虚名，在世人眼中和工作岗位上奋斗和沉浮的；还有我，为什么要走出国门，有时间将在后面的故事里讲给大家听。

附：文革期间，高考变动时间表。

1966 年，文革开始，高等学校停止招生。
1970 年，重新招生。首届工农兵学员。
1971 年，废除高考。高等院校大规模招生。
1976 年，文革结束。末届工农兵学员。
1977 年，恢复高考。

2019 年 2 月 10 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瓦蓝湖 初稿